

英汉双宾结构的语义诠释及其句法推导

佟和龙

(上海海事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双宾结构是自然语言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句式。分析发现,英语双宾结构中的间接宾语总是表示“目标”,而汉语双宾结构中的间接宾语则因动词类别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题元角色。英汉双宾结构具有共同的功能投射,它们的差异归结于功能语类FP中F获值方式的参数差异。英语双宾结构中的F值是内在性的[+to],与动词本身的方向性无关;汉语中F的值则必须在句中通过显性的方式获得,与动词本身的方向和功能语类“给/走”的使用密切相关。

关键词:双宾结构;最简方案;功能语类;施用结构;特征赋值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1)06-0075-10

0 引言

双宾结构(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是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的句法结构,一直是理论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其基本形式可以概括为:主语+谓语+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双宾结构的显著特征就是动词之后同时接了两个名词短语。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双宾结构的两个宾语之间存在领属关系的转移。例如,Kayne(1984)、Johnson(1991)、Pesetsky(1995)、Pylkkänen(2002,2008)、Harley(2003)、Beck和Johnson(2004)等对英语双宾结构的领属关系进行了研究;李临定(1986)、李宇明(1996)、王奇(2005)、李敏(2006)、孙天琦和李亚非(2010)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双宾结构领属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无疑深化了我们对双宾结构的认识,但学者们对双宾结构的句法推导过程远未达成共识,对英汉双宾结构差异的解释也存在分歧。鉴于此,本文在最简方案框架下以邓思颖(2003)和何晓炜(2006)的分析为基础并借助Pylkkänen(2002/2008)的施用结构投射,尝试从功能语类特征赋值参数差异的角度对英汉双宾结构的句法推导提出统一的解释。

1 相关研究进展评述

1.1 英语双宾结构

转换-生成语法框架下,Marantz(1984)和Larson(1988)较早对英语的双宾结构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Marantz(1984)的分析发现,英语的双宾结构本质上属于施用结构(Applicative Construction),句中含有施用语素,作为中心成分投射成ApplP,施用论元(间接宾语)合并并在[Spec, ApplP]处得到允准。间接宾语在句法层次结构上成分统制(C-command)动词的直接宾语,而直接宾语不能成分统制间接宾语,这种非对称成分统制关系是双宾结构的显著属性,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Marantz, 1984; Barss et al.,

收稿日期:2021-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句法语义界面视角下英汉名词短语的对比研究”(20BYY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佟和龙,男,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形式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1986)。Larson(1988)认为双宾结构是与格结构(Dative Construction)转换而来的,其推导过程类似于英语的被动化操作(Passivization)。间接宾语移到下层动词的指示语位置[Spec, VP];原本处于下层动词指示语位置的直接宾语则成了V'的附加语;动词通过中心语移位移动到上层动词的空中心语位置。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具有不同的推导步骤,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转换关系(Pesetsky, 1995; Harley, 2003; Beck et al., 2004)。其中,Harley的分析最具代表性,她认为双宾动词可以分解为 v_{CAUSE} 和 P_{HAVE} 两个中心语,其基本语义为“致使—拥有”;与格动词可以分解为 v_{CAUSE} 和 P_{LOC} 两个中心语,其基本语义为“致使—移动”。

Pylkkänen(2002, 2008)延续了Marantz(1984)的分析思路,并通过跨语言的对比研究提出了施用投射的参数化思想。她认为施用结构可以分为两类:高位施用结构(High Applicatives)和低位施用结构(Low Applicatives)。从句法结构来看,高位施用结构投射高于动词投射,低位施用结构投射低于动词投射。从语义关系来看,高位施用结构表明事件(Events)与个体(Individuals)之间的关系,低位施用结构表明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低位施用论元与直接宾语之间存在领属关系的转移,与动词没有直接的语义关联。按照这种分类,英语的双宾结构可归属于低位施用投射结构。

1.2 汉语双宾结构

在生成语法框架下较早探讨汉语双宾结构的是周长银(2000)。他借助Larson(1988)提出的VP-壳结构理论,认为汉语双宾结构与英语一样是由与格结构推导而来的。该分析的理论框架是管约论,其中许多分析思想和技术细节在最简方案中不再采用,如右向嫁接违反了线性对应公理(Kayne, 1994)。而且,一些基于语义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分别具有不同的结构,并不存在转换关系(Kayne, 1984; Pesetsky, 1995; Harley, 2003)。

最简方案(Chomsky, 1995/2019)认为语言的参数变异只与功能语类相关,而与词汇语类无关。对汉语双宾结构的相关研究也体现了这一核心思想,众多学者对汉语的双宾结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邓思颖, 2003; 程杰等, 2008; 孙天琦等, 2010; 何晓炜, 2011; 蔡维天, 2016; 柳娜等, 2018)。

邓思颖(2003)在最简方案框架下探讨了汉语的双宾结构推导,他认为双宾结构比与格结构多了额外的功能投射FP,位于VP和 vP 之间。F在给予类双宾结构中表示“拥有”;在取得类双宾语中表示“失去”。F在汉语中可以没有语音实现形式,也可以外在表现为“给”和“走”,而且在V到 v 的移位过程中,F是必经之路。如例(1):

(1) 张三寄给/走我一本书。



汉语双宾结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何晓炜(2011)的分析,在全面、系统对比英汉双宾结构之后,他提出了“双宾结构参数化”的分析思想。其核心观点是:双宾结构中存在功能语类投射GP, G表达传递意义,是英汉双宾结构差异的根源所在。汉语中,G的取值可正(G+)可负(G-)。前者构成右向双宾结构;后者构成左向双宾结构。G还可以有具体的语音外在表现形式,如“给”和“走”。英语只存在取正值的空成分G+,因此英语中只存在右向双宾结构。例(2)是汉语的双宾结构。

(2) 张三借给李四一本书。



通过功能语类 Appl 研究双宾结构是目前的研究趋势,但汉语的双宾结构究竟属于高位施用结构还是低位施用结构,目前仍有很大争议。程杰、温宾利(2008)认为汉语的双宾结构都可以归类为高位施用结构,其核心是一个表“经受”义的轻动词,“经受者”论元在[Spec, ApplP]处得到允准。孙天琦、李亚非(2010)认为以“我烧了他三间房”为代表的双宾结构中,非核心论元单独投射出一个论元位置,由汉语中偏爱来源性的低位施用操作引入。蔡维天(2016)指出,汉语的非典型双宾结构可以分析为中位施用结构,其核心是一个表示“蒙受”的功能范畴,允准非核心论元的合并。柳娜、石定栩(2018)对外宾结构进行了详细梳理,发现“吃、喝”类动词的“取得义”双宾结构不同于“给予类”双宾结构,它们不是外宾结构,而是施用结构。

1.3 已有研究评述

上述分析将双宾结构的语义差异归结于句法结构的不同,不仅符合生成语法“句法自主”的基本思路,而且也遵守了最简方案将语言的差异归结于功能语类的核心思想(王静,2010:76;熊仲儒,2020)。基于功能语类参数化的推导模式可以拓展到其他语言的双宾结构的研究,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分析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涉及题元角色的分配问题。邓思颖和何晓炜的分析中,双宾结构中的两个名词短语分别处于动词的指示语和补足语处。根据题元角色分配的局部性原则(Locality Principle),题元角色必须在其局部范围内得到满足。对于典型的双及物动词来说,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分别合并并在动词的指示语和补足语处,这种分析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内在单及物动词来说,则违反了题元准则,因为这些动词的题元栅(Theta Grid)中,动词只能与一个域内论元(Internal Argument)合并。何晓炜认为 G' 负责允准间接宾语“来源”或“目标”的题元角色,类似于动词给主语赋予题元角色的情况。这种类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们初始合并位置不同,主语合并并在[Spec, vP]处,而间接宾语合并并在[Spec, VP]处。

此外,上述分析还缺乏足够的解释充分性,仅将结构差异归结于功能语类的参数化会导致过度生成。既然汉语中的 G 可以取正值,也可以取负值,但是在“他偷了我一本书”这句话中, G 不能取正值。从词汇语义角度来看,汉语的“写”和英语的“write”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相应的结构中 G 取值则具有差异性。英语中可以取正值,汉语中如果也可以取正值,“他写了我一封信”就会被误判断为是合乎语法的。对于制作类动词(如烤、沏和煎等),何晓炜认为英语的动词可以进入双宾结构,汉语的动词与 G 不兼容,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规定性。

鉴于上述问题,有必要对双宾结构的句法推导进行重新分析。本文充分借鉴功能参数化思想和施用投射结构的合理之处,提出符合英汉双宾结构生成的可供操作的推导模式。在具体分析之前,首先对英汉双宾结构的语义诠释进行简要对比。

2 英汉双宾结构的语义诠释差异

英语双宾结构中的动词本身既可以是单及物的,如 steal、bake、write 等,也可以是双及物的,如 give、send 等(Tallerman, 2019: 218, 247)。但不管使用哪一种类型,双宾结构中两个宾语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间接宾语总是直接宾语的目标(Goal),表达的语义关系为“to the possession of”。从下面(3)的例子可以看出,动词的使用对双宾语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任何影响。

- (3) a. They say it would take them longer to stealme a car.
b. I came home to find that Greg had bakedme a cake.

c. My parents bought me a telescope when I turned 12.

d. I'm going to build me a summer resort.

相对于英语的双宾结构,汉语的双宾结构的使用更加复杂^①。从语义上来看,汉语存在“给予类”双宾结构和“非给予类”双宾结构(毕罗莎等,2019)。动词的方向以及“走、给”的使用都会对双宾结构的语义诠释具有一定的影响。朱德熙(1979)最早关注到双宾结构的方向性问题,石毓智(2004:84-86)后来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类。具体有如下四类:

(A)“抢、偷”类左向动词:客体移动的方向是从右到左,间接宾语是来源。这类动词后与“走”连用时,句子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与“给”^②连用时,句子的可接受度则迅速降低(表1)。“走”含有“使……失去”之意,与“抢、偷”类动词的语义兼容。英语 steal 也可以用于双宾结构中,但间接宾语是目标。例如“He stole me a book”表达的意思则是:他偷了一本书给我。

表1 “偷”接双宾语的可接受性

	高	较高	低	较低
他偷了我一本书 ^③	50.74%	34.98%	7.88%	6.4%
*他偷给了我一本书	9.85%	16.26%	35.96%	37.93%
他偷走了我一本书	45.81%	31.03%	13.3%	9.85%

(B)“寄、送”类右向动词:客体的转移方向是从左到右,间接宾语是目标。右向动词可以与“给”但不能与“走”连用(表2)。“给”含有“使……拥有”之意,与“寄、送”类动词语义兼容。英语中此类动词和汉语动词用法基本相同。如“He sent me a book”的意思是:他送了我一本书。

表2 “寄”接双宾语的可接受性

	高	较高	低	较低
他寄了我一封信	24.14%	29.06%	29.56%	17.24%
他寄给了我一封信	41.38%	30.05%	16.26%	12.32%
*他寄走了我一封信	10.84%	18.72%	43.35%	27.09%

(C)“租、借”类双向动词:客体移动的方向既可以从左到右,也可以从右到左。只有通过具体语境才能准确判断其方向。这类动词可以与“给”和“走”一起使用。英语中此类动词则没有这种灵活性。例如“He lent me a computer”只能表示“他借给我一台电脑”的意思。

(D)a. 他租了我两亩地。

b. 他租给了我两亩地。

c. 他租走了我两亩地。

(4)“画、写”类无向动词:此类动词并不标示任何移动方向。英语此类动词可以直接用于双宾结构,

① 本课题组于2018年1月通过问卷星软件对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次语感调查。问卷发放210份,回收有效问卷203份,被调查的对象主要来自江苏、上海、安徽、福建、山西、北京、云南等地区。有效问卷中,男性占29.06%,女性占70.94%;本科学历占45.81%,大专学历占44.83%,高中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较少。此次调研涉及不同地区、性别、年龄和学历等因素,因此调研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卷主要调查11个动词接双宾语的可接受程度,它们是“抢”“买”“寄”“偷”“写”“沏”“烤”“打”“汇”“舀”“炒”。这里呈现的是部分动词问卷调查结果。

② 这里的“给”与动词构成一个复合词而不是介词。我们在进行语感调查时,在“给”后面加上了体标记词“了”,以便将其与间接宾语分开。具体分析可参考邓思颖(2003:149-151)。

③ “我”和“一本书”之间可以插入状语性的成分,如一共、三次等,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该句是“他偷了我的一本书”中“的”字省略的结果。

而汉语中此类动词的可接受程度则相当低。但这类动词与“给”合用时,句子的可接受度则明显提高(表3)。

表3 “写”接双宾语的可接受性

	高	较高	低	较低
* 他写了我一封信	9.36%	13.79%	42.86%	33.99%
他写给了我一封信	33.5%	27.59%	24.63%	14.29%

通过语料库也可以说明这一点,(5)的两个例句分别来自北语语料库和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

(5)a. 从此,我不再折磨这死心眼的孝子了,而且常由袋子里抓给他一把糖果。

b. 早晨起来,大娘家去吃饭,春儿撒开了鸡窝儿,抓给它们一把粮食。

综上,英语双宾结构中间接宾语总是表示“目标”。与之不同的是,汉语双宾结构中的间接宾语因具体动词类别的不同而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汉语左向动词后面的间接宾语表示来源;汉语右向动词后面的间接宾语表示目标;汉语双向动词后面的间接宾语既可以指来源,又可以指目标。此外,汉语左向、双向和无向动词后面可以接“走”,而右向动词则不能;汉语中右向、双向和无向动词后面可以接“给”,而左向动词则不能。英汉双宾结构的语义诠释差异如表4所示:

表4 英汉双宾结构的语义诠释差异

动词类别	汉语间接宾语		动词—给/走		英语间接宾语	
	来源	目标	走	给	来源	目标
左向	✓	×	✓	×	×	✓
右向	×	✓	×	✓	×	✓
双向	✓	✓	✓	✓	×	✓
无向			✓	✓	×	✓

3 英汉双宾结构的句法推导

3.1 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乔姆斯基在原则与参数总框架下,提出了“最简方案”的研究思路。最简方案认为,人类语言具有共同的运算系统,语言变体只局限于词库中那些非实体性部分和词汇项目的一般性特征。句法结构通过合并(Merge)实现,包括外部合并(External Merge)和内部合并(Internal Merge)两种操作,外部合并的两个成分是独立的实体,内部合并的一个成分是另一个成分的组成部分。合并的两个句法体构成一个无序集合,即 $\text{Merge}(X, Y) = \{X, Y\}$, X和Y没有前后顺序之分,线性顺序只是感觉—运动系统施加的界面条件。

为了减轻句法运算的负担,在推导的某个阶段,合并产生的句法体需要实施拼读操作(Spell-out),将生成的结构分别送往逻辑式和语音式进行诠释。乔姆斯基认为,拼读在语段层面逐步进行,一旦语段形成,其补足语实施拼读操作,语段的中心语及其投射的短语仍然留在运算系统中,直到下一个语段形成之后才拼读出去。通常认为,vP和CP是两个独立的语段(傅玉,2010:93-99)。

有了语段的概念,移位不再区分为显性移位和隐性移位,特征强弱的区别也随之消失。乔姆斯基认为,不可诠释的特征必须在词库中有所标示,假定词项中有些特征在词库中有些已经赋值(Valued),有些

则未赋值(Unvalued),那么未赋值的特征必须在句法运算过程中取得相应的值。一致操作的目的是给不可诠释的特征进行赋值。要实施一致操作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探针(Probe)和目标(Goal)都必须处于活跃状态;探针和目标的特征必须相互匹配;目标必须处于探针的搜索范围之内;探针和目标必须处于局部关系。上述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实施一致操作。简而言之,探针就是具有不可诠释特征的中心语,如核心功能语类 C, T, *v* 等;目标就是具有相应可诠释特征的短语,如 DP。目标要能够参与一致操作,除了具有可诠释特征之外,还要具备不可诠释特征,以确保目标处于活跃状态。一旦不可诠释的特征获得相应的值之后,就不能参与之后的句法操作。

3.2 基本假设

为了系统解释英汉双宾结构的诠释差异,我们在分析中提出了如下基本假设:

a. 英语和汉语都存在低位 ApplP 投射。Appl 确保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之间存在领属转移的关系(Transfer of Possession),但是 Appl 的值在句法合并时标示不足(Underspecified),必须在句法运算中通过一致操作才能获得。b. 英语和汉语都存在功能语类 FP,位于动词短语 VP 和轻动词短语 *v*P 之间。功能语类 FP 具有[+EPP]特征,间接宾语移到[Spec, FP]处核查该特征。c. 英汉双宾结构的差异归结于功能语类 FP 中 F 值的参数化。英语中, F 的值是内在右向性的;汉语中 F 的值则必须在句法中通过显性的方式获得。其获得方式有两种: F 显性为“给”或“走”; F 为空拼读时(Null Spell-out),动词的方向含义传递给 F。

3.3 英语双宾结构句法推导

以“He wrote me a letter”为例,该句^①的推导过程如下:首先,动词 V 与 Appl 的最大投射 ApplP 合并,构成 VP。此时 me 和 a letter 分别位于 ApplP 的指示语和补足语处,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语义关系^②,但此时还不能确定其具体关系。在 *v*P 语段中,VP 与 F 进行合并投射成 FP;FP 与 *v* 进行合并投射成 *v*P。F 是没有具体语音形式的功能语类,其作用是为双宾结构提供方向,英语中 F 的值是默认的、内在性的[+右向性],其方向性基本不受具体使用的动词的干扰或影响。同时我们认为 F 的特征是不可诠释的[*u*F TO],Appl 的特征是可以诠释的、未赋值的[*i*F _]。F 成分统制 Appl,此时 F 可以与 Appl 建立一致关系^③(Agree)。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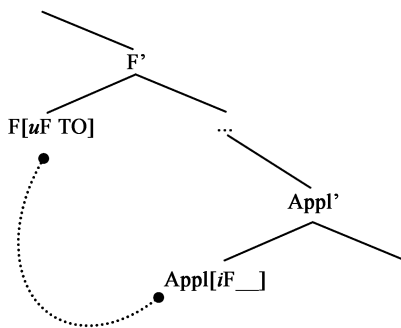


图1 F 与 Appl 的一致操作

- ① 最简方案认为 *v*P 和 CP 是语段(Chomsky 2001)。双宾结构中的两个宾语处于 *v*P 语段中,我们这里主要分析 *v*P 语段的推导过程。
- ② Pytkäinen 讨论了低位 ApplP 投射中存在的两种语义关系,即 from 和 to。Cuero 进一步分析之后发现除了两种动态的语义关系之外,还有静态的语义关系,即 at。本文只涉及前者,即动态的语义关系。
- ③ 乔姆斯基的一致操作中,不可诠释的特征未赋值,可诠释的特征已经赋值。Pesetsky & Torrego(2001)认为同样存在赋值的不可诠释特征 *u*F[val] 和未赋值的可诠释特征 *i*F[]。例如动词和时态 T 的一致关系可以体现这一点。句子时态的形态标记虽然体现在动词上,但是时态的诠释是在 T 处进行。因此赋值虽然在动词上,但是不可诠释;T 虽然没有赋值,然而却是可诠释的。它们进行一致操作后,T 获得时态的值,动词的时态特征被删除。这里我们认同他们的看法。

一致关系确立之后, F 的不可诠释特征被删除, Appl 获得了相应的值[+to]。v 是轻动词, 具有强动词特征, 该特征促使主动词 V 上移, 与 v 嫁接。但在移位过程中, V 首先必须经过 F。同时功能语类 F 的[+EPP]特征导致 me 移到其指示语处, 核查相关特征(图 2)。之所以吸引间接宾语 me 而不是直接宾语 a letter, 是因为 me 到[Spec, FP] 的距离更近, 符合了最短距离移位(Shortest Move)的要求。vP 语段形成之后, 其补足语 FP 立刻实施拼读的操作。在概念—意向系统(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中, 英语双宾结构始终具备“致使—拥有”的意义。

这里我们假设了双宾结构具有 ApplP 和 FP 功能投射。上述句子似乎还有另一种更加“经济”的分析方法, 就是直接假定英语双宾结构中的 Appl 值是内在右向性的, 不需要通过与 F 建立一致关系而获得相应的值, 这样也就无须假设 FP 投射。从表面上来看, 更加符合最简方案的经济性原则, 但基于理论和语言事实方面的考虑, 这种分析方法必须放弃。

根据最简单方案研究的一致性原则(Uniformity Principle): 在没有确凿相反证据的情况下, 假设语言是一致的, 所有的语言共享普遍的语法特征集, 只不过并非所有的特征都有其语音表现。例如, 制图方案就是遵循这种思想, 认为所有的语言的结构都是由固定的功能层级构成, 差异只是语音层面上的。因此, 鉴于汉语中存在显性的功能语类 F, 我们认为英语同样存在 FP, F 通常没有具体的语音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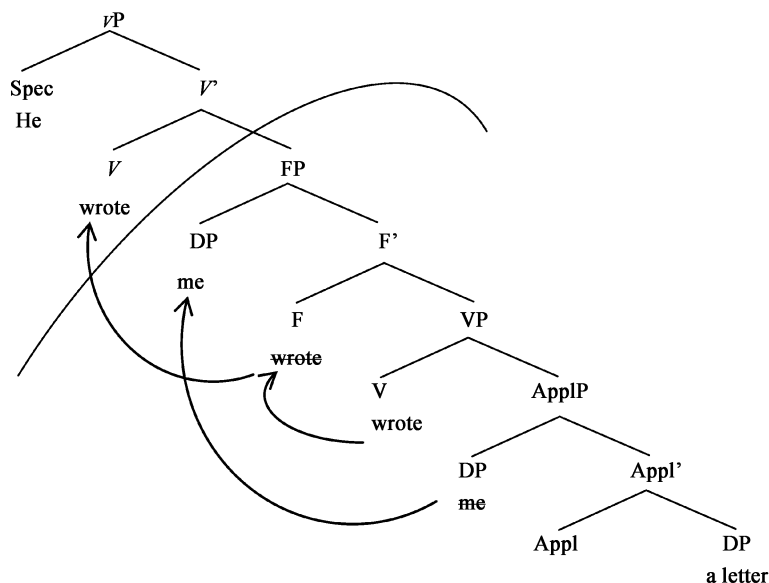


图 2 “He wrote me a letter”的句法结构

此外, 相关语言事实也支持 vP-FP-VP-AppIP 的投射顺序。英语中两个宾语之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 例如:

(6) They gave us each a present.

如果只有 vP-VP-AppIP 投射, each 的句法合并位置就不能得到合理解释。我们的分析思路可以为上述句子的 each 提供合适的句法位置。可以认为在句法结构中, each 嫁接在 VP 处。

当然, 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英语的动词都可以用于双宾结构。例如:

(7) *He drank me two beers.

该句可以通过合并的手段生成, 但是无法在概念—意向系统中获得有意义的解释, 因为不可能通过“他的喝”而使我获得两瓶啤酒。

3.4 汉语双宾结构的句法推导

汉语双宾结构中两个宾语的关系不像英语那样呈现较好的一致性, 这表明汉语 F 的赋值方式不同于

英语。我们将英汉双宾结构的差异归结于功能语类赋值方式的差异。汉语双宾语的句法结构推导过程和英语相同,差异在于F的值不是默认的[+TO],而是在狭义句法中通过功能语类和动词的共同作用而得到确定的。当双宾语在ApplP的指示语和补足语合并时,它们的具体关系没有得到确定。F的方向必须通过具体的具有语音形式的词汇来体现,不同的动词以及“给”或“走”的出现与否都会影响句子的意义和合法性。

3.4.1 单向动词

单向动词中,动词含有明确的传递方向,即“左向”或“右向”。F的方向值可通过动词获得。然后F再与Appl进行一致操作。如果此类双宾结构中含有“给”或“走”,F则可以直接取得相应的值。动词的方向通常要与“给”或“走”的方向一致。不一致的方向则很难在概念一意向系统中获得合乎逻辑的解释,句子的可接受度比较低。“他抢走我钱包”这句话中,动词短语vP语段的生成结构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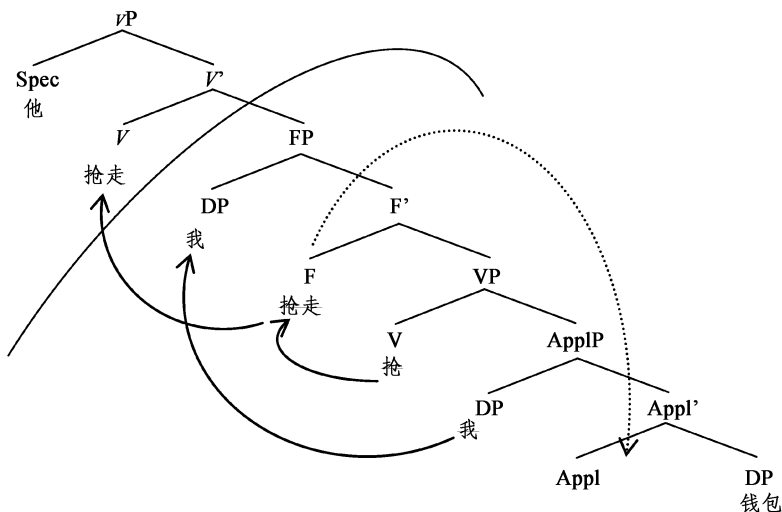


图3 “他抢走我的钱包。”的句法结构

双宾结构中的“V-给/走”是在句法而不是在词库中生成的(邓思颖 2003; Paul et al., 2010)。动词V在移位过程中,首先与F嫁接,然后整个成分再与v嫁接,生成V+F+v的形式。由于受到中心语移位的限制(Travis, 1984),动词V不能越过功能语类F直接与v嫁接。而且,V+F必须作为整体上移,因为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只存在循环论元/非论元移位,而不存在循环中心语移位。间接宾语移动到[Spec, FP]处核查F的[+EPP]特征。

基于结构一致性的考虑,本文假设没有“给”或“走”的双宾句中同样含有功能投射FP。从汉语的语言事实来看,这样分析还可以较好地下面句子的分配量词(Distributive Quantifier)和频率副词(Adverb of Frequency)提供合适的句法位置^①。例如:

- (8) a. 他寄了我们每个人一本书。
- b. 他寄了我们三次书。
- c. 他寄了我们每个人三次书。

“每个人”和“三次”可以处于双宾语之间,说明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已经不在一个最大投射之中。通常认为,“每个人”和“三次”嫁接在动词短语VP处。假设有了功能投射FP,间接宾语移到[Spec, FP]

^① 程杰和温宾利(2008)认为,只有假设双宾语中存在高位ApplP结构,才能合理解释分配量词“各”的句法位置,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低位ApplP结构同样能够解释相关结构。

处,上述句子的线性语序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3.4.2 双向动词

双向动词中,由于动词既可以是“左向”也可以是“右向”的(图4)。若没有一定的语境,这类句子通常可以有两种诠释。例如,“他借了我一本字典”既可以理解为“他借了一本书给我”,也可以理解为“他从我这里借了一本书”。当取“左向”时,表示“失去”义,其“右向性”被抑制;当取“右向”时,表示“拥有”义,其“左向性”被抑制。若上下文明确,或句子中F显性为“给”或“走”时,方向就具体化,句子便不再有歧义。例如“他借给了我一本书”和“他借走了我一本书”,英语中此类结构之所以只有一种理解,根源在于英语的F的值是内在确定的,不受动词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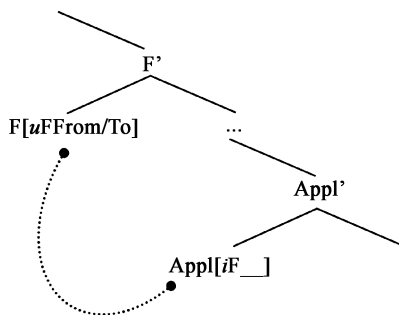


图4 双向动词中的一致操作

3.4.3 无向动词

前面提到,汉语中F的取值来源有二:动词和外化的F。无向动词本身不具有方向性,F就不可能从动词处获得相应的值。即使F与Appl进行一致操作,也不能使得Appl获得相应的方向值。而且,虽然存在F功能投射,缺乏外化形式的F也无法取值。如果这样,生成的结构表达式就会崩溃(Crash),因为在逻辑式中不能得到相应的语义诠释。挽救此类句子的办法之一就是给F具体的语音形式。例如,动词“写”缺乏方向性,“他写我一封信”的可接受度较低,但“他写给我一封信”的可接受度就很高。

4 结语

本文在最简方案框架下,对英汉双宾结构的生成尝试进行了统一的处理,是现有双宾句式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英汉双宾结构具有相同的结构层次和推导过程,最简方案将语言之间的差异归结于功能语类,可以比较成功地分析双宾结构的相关句式。具体来说,英汉双宾句式的差异是由功能语类F的赋值方式不同导致的。英语双宾结构中的F值是内在性的[+to];汉语中F的值则必须在句法中通过显性的方式获得,与动词本身的方向和功能语类“给/走”的使用密切相关。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表明:通过最简方案的相关观点解释跨语言的差异是可行的。本文只是对双宾结构提出了初步分析方案,其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没有讨论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是否存在结构上的转换关系。此外,双宾结构的被动形式具有不对称性,如何在本论文的框架下对其提出合理解释是今后值得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Barss, A. & H. Lasnik. 1986. A Note on Anaphora and Double Objects[J]. *Linguistic Inquiry* (2): 347-354.
 Beck, S. & K. Johnson. 2004. Double Object again[J]. *Linguistic Inquiry* (1): 97-124.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IT Press.
 Chomsky, N. 2001. Derivation by Phrase[G]// M. Kenstowicz. *Ken Hale: A Life of Language*. Cambridge: MIT Press.
 Chomsky, N. 2019. Some puzzling foundational issues: The Reading program[J]. *Catal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Special Issue*:

263-285.

- Harley, H. 2003. Possession and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G]// P. Pica & J. Rooryck. *Yearbook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Johnson, K. 1991. Object Positions[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4): 577-636.
- Kayne, R. 1984. *Connectedness and Binary Branching*[M].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Kayne, R.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M]. Cambridge: MIT press.
- Larson, R.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J]. *Linguistic Inquiry* (3): 335-392.
- Marantz, Alec. 1984. *On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M]. Cambridge: MIT Press.
- Paul, W. & J. Whitman. 2010. Applicative structure and Mandarin ditransitives[G]// M. Duguine, S. Huidobro & N. Madariaga. *Argument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Relations*.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Pesetsky, D. & Torrego, E. 2001. T-to-C Movemen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G]// M. Kenstowicz. *Ken Hale: A Life of Language*. Cambridge: MIT Press.
- Pesetsky, D. 1995. *Zero Syntax: Experiencers and Cascades*[M]. Cambridge: MIT Press.
- Pylkkänen, L. 2002. *Introducing Arguments*[D]. Cambridge: MIT.
- Pylkkänen, L. 2008. *Introducing Arguments*[M]. Cambridge: MIT Press.
- Tallerman, M. 2019. *Understanding Syntax*[M]. London: Routledge.
- Travis, L.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f Word Order Variation*[D]. Cambridge: MIT.
- 毕罗莎, 潘海华. 2019. 信息结构理论与汉语双宾结构的内部差异[J]. 外国语 (1): 39-49.
- 蔡维天. 2016. 论汉语内、外轻动词的分布与诠释[J]. 语言科学 (4): 362-376.
- 程杰, 温宾利. 2008. 汉语两类非核心论元的 Appl 结构分析——兼论英汉 Appl 结构之差异[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 82-87.
- 邓思颖.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傅玉. 2010. 论最简句法中的“语段”及其理论局限性[J]. 外国语文 (2): 93-99.
- 何晓炜. 2011. 英汉双宾结构的生成语法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李临定. 1986. 现代汉语句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敏. 2006. 双宾动词的词汇语义和双宾句式语义的互动[J]. 世界汉语教学 (4): 55-66.
- 李宇明. 1996. 领属关系与双宾句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3): 62-73.
- 柳娜, 石定栩. 2018. 外宾结构的性质与动—宾组合的及物性[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32-43.
- 石毓智. 2004. 汉英双宾结构差异的概念化原因[J]. 外语教学与研究 (3): 83-89.
- 孙天琦, 李亚非. 2010. 汉语非核心论元允准结构初探[J]. 中国语文 (1): 69-78.
- 王静. 2010. 生成语法中的语言共性研究[J]. 外国语文 (3): 74-76.
- 王奇. 2005. 领属关系与英汉双宾构式的句法结构[J]. 现代外语 (2): 129-137.
- 熊仲儒. 2020. 论元的引进与允准[J]. 外国语 (4): 12-22.
- 周长银. 2000. 现代汉语“给”字句的生成句法研究[J]. 当代语言学 (3): 155-167.
- 朱德熙. 1979. 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方言[J]. 方言 (2): 3-9.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and Syntactic Deriv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TONG Helong

Abstract: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DOC) is a very important sentence pattern in natural language. Th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indirect objects in English DOCs invariably assume the theta role of “goal”. However, the Chinese indirect objects exhibit different theta roles. It is assumed that English and Chinese DOCs have the same functional projections. The differences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way in which F derives its value. In English, the value of F is inherently [+to] and is unaffected by the directionality of the verb, while in Chinese the value must be overtly obtained,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ality of the verb *per se* and the functional categories “GEI” and “ZOU”.

Key words: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minimalism; functional category;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 feature valuation

责任编辑: 路小明